

童子軍傳訊隊



National Service Badge

民防章
Civil Defence Badge

香港童子軍傳訊隊的歷史，可追溯至1930年代末期，當時世界政局動盪，無論在歐洲或亞洲皆戰雲密布。香港童子軍總會在1937年10月，應政府所求，認為童軍服務在緊急時期十分有用，所以特別提供防空傳訊（ARP即Air Raid Precaution Messenger）和急救等訓練。後更成立童子軍防空傳訊隊（Boy Scouts ARP Despatch Corps）或簡稱童子軍傳訊隊（Boy Scout Despatch Corp）。由九龍區區總監陳福康兼任負責領袖，至1941年初他離港往上海後，改由香港第7旅旅長鮑德漢（John PAU）任負責領袖。

童子軍傳訊隊隸屬政府防空部門，為配合政府的防空分區，每區設區長（District Warden）及副區長（Assistant District Warden），另設若干隊目（Senior Warden）和傳訊員（Despatch Rider）等職級。區長由童軍領袖擔任，而傳訊員分為摩托車和單車兩種。摩托車傳訊員主要是羅浮童軍，作跨區之訊息傳遞，而單車傳訊員則負責區內傳訊。

據1939年4月16日星島日報報道，曾參加防空訓練之童軍達500人（約佔全港童軍人數1/3），且得家長准許，在緊急情況下服務，負責任務包括「專為擔任傳遞消息，及其各種通訊，盡準備戰事一旦降臨，電話等交通工具具有毀壞，港九各區之消息傳遞，發生空襲，彼輩即擔起肩負各方面之消息報告。」

曾參加戰時童子軍傳訊隊而現時仍在港的隊員雖然稀少，但仍能聯絡訪問，將其親身經歷，為各位介紹。

王昌雄—九龍第17旅（喇沙書院） 童子軍（BOY SCOUT）

王昌雄在1939年約15歲即加入喇沙書院主辦之九龍第17旅童軍。翌年參加童子軍傳訊隊，為基本之單車傳訊員，屬深水埗區。因家住大埔道，加入後接受2至3個月之訓練，通常在週末舉行，由陳福康等任教練。經考試合格後，獲民防章（Civil Defence Badge），屬童軍專科章之一。



其後每約3至6個月舉行演習，大都事前有通告，主要工作為利用單車傳訊。傳訊隊並沒有特別制服，除本身的童軍制服外，另加白色臂章以資識別。

1941年12月8日日軍空襲前一天，他曾到西貢濠涌探訪全港羅浮童軍大會。當時感到戰爭即將發生，不少在英軍服役或參加義勇軍之羅浮童軍，紛紛離營返回軍營報到。12月8日清晨，空襲警報響起後，王昌雄即穿着童軍制服，前往設在寶血醫院隔鄰之防空站報到。後轉派往深水埗警署。

在日軍攻破醉酒灣防線後，王昌雄家人便遷往親戚位於尖沙咀較安全的家中，而他亦立即要求調往尖沙咀，並於九龍倉之防空站當值。在英軍撤出九龍前，他亦聽從家人吩咐，並沒有和大隊撤退至港島。

楊俊文—九龍第21旅（中華基督教青年會） 羅浮童軍（ROVER SCOUT）

楊俊文於1939年加入童軍，雖然家住港島灣仔，但和同學加入位於九龍之童軍旅團。1940年加入童子軍傳訊隊，因為已晉升羅浮童軍，故被編入摩托車傳訊隊。九龍第21旅參加童子軍傳訊隊的人數並不多，大都是羅浮童軍，如羅浮隊長梁永耀。



楊俊文雖家住港島卻選擇加入在九龍的傳訊隊。除學習各種防空知識外，更由政府派員教授駕駛摩托車，由於年輕加上「膽粗粗」，很快便學懂駕駛摩托車。

戰事開始時，曾在九龍區服務，後因戰事緊張，聽從家人勸告，在英軍撤出九龍前返回港島。後因聽聞有童子軍傳訊隊隊員在黃泥涌峽激戰中喪生，故沒有繼續童子軍傳訊隊的服務。

謝炳奎—香港第10旅（聖保羅書院） 羅浮準備員（ROVER SQUIRE）

「老總」謝炳奎於1935年加入就讀之聖保羅書院之香港第10旅。據老總憶述，約在1940年，香港童子軍總會才開始組織童子軍傳訊隊，也許由於當年他只是童軍，對總會事務並不太瞭解，戰後回想，也許經過1939年夏季，德軍狂炸倫敦後，總會才作較積極之反應。



老總同樣在1940年加入童軍傳訊隊，入隊基本條件是能夠使用單車。由於已考獲單車章，故與同隊之簡守淳、羅家襄、潘興傑、陳寶光、余天順等齊齊參加。而同旅的羅浮隊長（Rover Mate）盧庭海則參加摩托車傳訊隊。

訓練由政府委派防空教練擔任，主要是使用防毒面具、認識毒氣的種類、如何應付空襲等。同樣考試合格後可獲民防章，但沒有NS章（National Service Badge），不過有些羅浮童軍則有此章。後亦曾參與2至3次演習，事前均有通告，惟最後一次則沒有，作突發性之演習，不久戰爭便爆發。

1941年戰爭爆發前，老總晉升羅浮團為準備員，因而為童子軍傳訊隊中區4隊目之一。其餘有香港第15旅（華仁書院）之陳獲榮、另一位屬香港第1旅（聖約翰書院），但已忘記了最後一位的名字和旅團。

12月8日警報響起後，老總即往皇仁書院（今荷李活道警察宿舍）之防空站報到，得知並非演集後，立即和其餘童軍紛紛找電話通知家人。後領取單車及被派往中區鐵崗聖保羅書院之救傷站當值。設備除童軍制服和臂章（上有英皇皇冠和英文ARP及MESSENGER字樣），更獲分派軍用鋼盔和防毒面具。

救傷站由聖約翰救傷隊負責，並由1名醫生擔任指揮。由於電話通訊並未中斷，故老總並沒有甚麼特別任務。及後聖約翰救傷隊出動時，老總亦一起出動，因熟悉中環及附近一帶，便作嚮導帶領救傷隊前往災場，故亦曾經歷不少緊張和驚心動魄的場面。例如中環街市和安瀾街中彈事件。另亦曾聽聞在荷李活道附近，有童子軍傳訊隊隊員被磚石擊中喪生。

老總在17天的香港防衛戰中一直有服務，到12月25日聖誕日早上，在學校遇見校長兼義勇軍上尉史伊尹（CAPT. STEWART）負傷參加崇拜，下午即從廣播中得知英軍投降，隨即將鋼盔等裝備棄置後，回家脫下童軍制服收藏起來，和全港市民一樣，面對日佔時期。

更正啟事 上期「由和平紀念日說起」一文，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於1914-1918年，謹此更正。✿